

個體化競賽與社會支持： 大學生轉專業歷程研究

馮博雅* 王婉茵**

* 馮博雅（1980-），男，廣東工業大學法學院講師，臺灣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生，主要從事社會工作相關教學與研究。通訊位址：廣州市天河區迎龍路161號廣東工業大學（龍洞校區）實驗樓C1棟，郵編：510520；電話+86 13751841173。Email：fbv21cn@gdut.edu.cn。

** 王婉茵（1999-），女，廣東工業大學法學院學生。

收稿日期：2022年8月12日；同意刊登日期：2022年11月30日。

摘 要

轉專業對於大學生來說是一件改變學習和生活軌跡的重要事件，但有關大學生轉專業歷程的研究很少。通過敘事研究對大學生轉專業歷程、挑戰、對策與社會支持情況進行分析發現，大學生轉專業歷程可分為探索期、準備及嘗試期、成功及適應期三個階段，有部分大學生經歷失敗及再次嘗試階段。大學生轉專業面臨環境與個人方面挑戰，採取對策包括適應環境和提升自我競爭力，得到社會支持包括正式-非正式、工具性-表達性類型。轉專業過程是個體化競賽過程，學校提供公平競爭環境和裁判，大學生自主爭取專業選擇權。研究認為大學應弱化轉專業過程競賽屬性，強化正式支持的系統性和計劃性，增加正式與非正式支持協同性，增能大學生在轉專業過程中獲得成長。

關鍵字：大學生轉專業歷程、個體化競賽、社會支持

Self-Responsibility Competition and Social Supports: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Major of College Students

Feng Boya · Wang Wanyin

Abstract

Changing major is an important ev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which change their trajectory of study and life, but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major. Through narra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challenges, countermeasures and social supports of changing major, and finds it can commonly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exploration period, preparation and trial period, success and adaptation period, and some other college students experience failure and re-trial stage. College students have to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and personal challeng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major. Their countermeasures include adapting to the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self-competitiveness. Their social supports include formal-informal, instrumental-emotional types.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major is a self-responsibility competition process. The university provides a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and judges, and college students independently strive for the right to choose a major. This article suggest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weaken the competitive attribute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major. They should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planning of formal support, and increase the synergy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support, so as to enable college students to grow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major.

Key words: process of changing major of college students 、 self-responsibility competition 、 social supports

1990 年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首次頒佈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第二十條和二十一條指出學生因為專長、疾病或生理缺陷、學生確有某種特殊困難的可向所在系申請轉專業（國家教育委員會，1990）。200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發佈《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十八條指出學生可以按學校的規定申請轉專業，學生轉專業由所在學校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5）。2016 年修訂通過並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二十一條指出學生在學習期間對其他專業有興趣和專長的，可以申請轉專業，學校應當制定有關轉專業的具體辦法、標準、程式，健全公示制度，休學創業或退役複學的學生因自身情況需要轉專業的，學校應優先考慮（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7）。從上述規定變化過程可以發現，一開始對於大學生轉專業有比較具體的條件限制，後來強調按照學校規定，再後來強調尊重學生的興趣和專長，特別照顧休學創業和退役複學大學生轉專業權利。從上述規定的變化過程可以看出隨著高等教育擴招、本科生群體的多元化和異質性增強（包志梅，2022），教育政策越來越賦予大學和大學生更多的轉專業操作空間。從媒體報導看大學生的轉專業熱情是比較高的（韓曉玲，2006），有的大學生寧願留級也要轉專業，即便課業壓力比較大（王峰、李欣玥，2021），而且轉專業的難度「不亞於一次高考」從而需要瞭解資訊和付出努力（宋偉濤，2014）。雖然專業選擇權是大學生的學習權利（江彬，2015；金勁彪、韓瑋，2016），但是大學生轉專業不是容易的事情，成功轉專業的大學生需要具備優異成績和比較強的適應能力（方樂等，2007），而且轉專業是一個過程，因而需要瞭解過程中的不同階段以便形成更好的理解（Bäulke et al.,2021）。因此，本文關注以下研究問題：大學

生轉專業的歷程可劃分為什麼階段？各階段中遇到什麼挑戰？大學生應對挑戰的對策和得到的社會支持是怎樣的？本文以中國大陸轉專業成功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旨在探索其經歷的過程、挑戰、對策和社會支持，進而為高校教育工作者正確引導轉專業大學生度過轉專業前後的全過程的成長成才提供參考，為社會工作教育提供啟發。引入社會支持網絡理論視角研究大學生轉專業歷程，明晰歷程不同階段大學生得到的社會支持類型，對大學生轉專業現象的研究增加了一種理論視角。

壹、文獻檢閱

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實行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制度使得高等教育市場化，大學生交學費給大學接受教育，他們與大學之間是教育契約關係，作為教育消費者大學生應該享有選擇教育內容的權利（郭為祿，2005）。專業選擇權是選擇教育內容權利的一部分，大學生需要有專業選擇權是因為填報志願時為了被錄取而被迫調劑到不喜歡專業，又或者填報志願時由於資訊不對稱盲目或隨意填報高考志願，就讀大學之後才發現興趣所在（樊華強，2012）。轉專業的權利屬於公民學習權，但是法律上界定不清缺乏保證機制，大學管理制度設定成績、名額、次數和對象等要素限制大學生的專業選擇權（袁媛，2020）。法律與大學的管理制度構成了大學生轉專業的制度背景，大學資源的有限性使得學校需要運用「平等」的準則協調大學生個體之間的利益關係（任麗清、劉劍虹，2009）。現有研究反映出即使轉專業是困難的，仍然有大學生因為家庭背景比較差（來自農村、家庭屬中低收入

及以下階層、父母未接受過高等教育和從事社會地位較低的職業)、學業挫折、就業前景和興趣愛好等原因申請轉專業(蘇強等, 2016; 熊豔青等, 2019), 而且學生在轉專業之後面臨學習(方蓬, 2014)、生活(馮偉光等, 2013)、心理調適(閔妍, 2013)以及就業形勢(吉久陽、皋春, 2019)的挑戰。總體而言, 中國學者肯定了轉專業是一種權利, 學生轉專業動機有家庭、個人和就業的影響因素, 轉專業之後面臨個體和環境的挑戰, 所以學校應該有制度上、管理上和指導上的設置以幫助學生度過轉專業的過程。面對大學生轉專業的行為大學的教育工作者是負有引導和提供必要支持的責任的, 因為高校辦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培養創新人才(韓雙淼、謝靜, 2021), 服務性與人性化應該是大學的制度內容(別敦榮, 2004), 教育應該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和自我發展(Whitehead 著、刘玥译, 2019)。雖然客觀條件限制大學不能保證想要更換專業的大學生都能成功轉專業(馬莉萍、張心悅, 2021), 但是大學的教育工作者應該扮演增能者角色, 增強引導大學生在轉專業過程中的自我探索和成長(鮑麗薇等, 2017)。已有文獻缺乏對大學生轉專業前、中、後全過程的研究, 也缺乏從微觀視角反映大學生如何經歷轉專業的全過程, 這不利於大學的教育工作者針對大學生轉專業的全過程進行預防性和補救性的干預。本文基於社會支持網絡理論認為大學應通過系統性和計劃性的正式支持並激發非正式支持網路作用, 協助大學生強化自我認識和自我規劃, 提高心理調適能力, 增強個人社會整合度和協助個人解決學習與生活中的問題(宋麗玉等, 2012: 319), 幫助大學生從轉專業過程中獲得個人成長並培養「對待生活的各種可能的終極態度」(渠敬東, 2006)。大學生在轉專業歷程中面對不同挑戰, 他們可運用自身內在資源和外

在資源來因應挑戰。社會支持網絡屬於外在資源的一類，可以分為工具性支持和表達性支持，其中工具性支持指引導、協助、有形的支持與問題解決行動；表達性支持指心理支持、情緒支持、自尊支持、情感支持及認可等互動與交心（宋麗玉等，2012：322-323）。也可以分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其中正式支持指法制、醫療、社會福利機構等專業性社會系統；非正式支持指家人、親戚、朋友、同事、鄰居等個人互動社會網絡（陳肇男、林惠玲，2015：14-15）。根據交互分類可得到工具性正式支持、工具性非正式支持、表達性正式支持、表達性非正式支持等支持的類型如下表所示。

表 1 得到支持的類型

支持面向 支持來源	工具性	表達性
正式	工具性正式支持	表達性正式支持
非正式	工具性非正式支持	表達性非正式支持

梳理文獻發現中國現有研究提及學業輔導部門應該開展轉專業諮詢輔導工作引導學生自我認知和自我探索（歐堪蘭等，2015），教師應該加強專業宣傳，大學應完善其轉專業制度（高昌明，2015），加強對學生的轉專業指導、規範轉專業的教學管理（唐紅妹，2009），這些研究涉及工具性正式支持。國外研究提及大學生參加社團而產生改變專業的動機（Mun-mi & Young-shin,2013）則涉及表達性非正式支持。中國已有大學生轉專業方面研究偏重工具性正式支持探討，缺乏工具性非正式支持、表達性正式支持和表達性非正式支持方面探討。根據中國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關注大學生轉專業歷程中面對的挑

戰和應對挑戰時運用的各類支持，期待為大學和教育工作者提供必要的介入依據以及豐富學界對於大學生轉專業的社會支持方面的理論理解。

貳、研究方法

一、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是普通高等學校成功轉專業的大學生。訪談對象來自廣東省的一所本科大學 A 大學。選擇該大學的原因是該大學每年招生規模大（在一萬人以上），而且並非 985、211 或雙一流大學，但是中國的大多數普通大學的辦學條件與這所大學相近。已有的研究比較多關注 985 大學和 211 大學的轉專業情況，例如鮑麗薇等（2017）研究清華大學的電腦系加強轉系學生的培養管理的方法，熊豔青等（2019）研究的是研究型大學（985 或 211 大學）轉專業意向學生的學習經歷，馮偉光等（2013）研究北京師範大學的大學生轉專業動機及適應性，但是像 A 大學這樣的普通大學在中國是大多數，然而相關的研究卻比較缺乏。

訪談對象的選擇注重了性別和專業流向。以往研究關注到性別對轉專業之後的適應性可能有影響（馮偉光等，2013），本次訪談對象包含男性和女性。英國大學轉專業分為跨學部或跨學系轉換專業與同學部或學系內轉專業兩種轉專業模式（馬廷奇、鍾穎，2017），中國的大學生轉專業同樣也可分為跨學部或同學部的情況，但是對此中國學者的研究很少關注兩種對象群體的分別，其中有文獻提及學科背景（理科、工科、文科）影響大學生轉專業意向可能性（熊豔青等，2019）。

根據本文作者日常觀察，跨學科門類轉專業（例如工學門類轉管理學門類）比同學科門類轉專業（例如法學門類內部不同專業互轉）需要補充更多的專業基礎課，前者的轉專業大學生比後者的轉專業大學生在新專業學習中可能遇到更多的挑戰。本次訪談對象包含同學科門類轉專業的學生和跨學科門類轉專業的學生。在訪談中發現有被訪者是寧願降級也要轉專業的，雖然這樣的現象很少出現，但是本次研究也尋找到三個這樣的被訪者。本次研究通過全校公選課、微信、微博等網絡平台以及滾雪球的方式招募訪談對象，訪談的時間、地點和時間長度如下表所示。訪談的步驟參照下面研究方法部分陳述的訪談大綱進行，在具體訪談過程中注意適當對被訪者的敘述路線保持開放和彈性。被訪者具體情況如下表所示。

表 2 訪談對象資訊

被訪者	代稱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長度	性別	年級	轉專業次數	專業流向
1	WX	2022/2/28	辦公室	56 分鐘	男	大三 (降級)	2	跨學 科門 類
2	HJ	2022/3/1	電話	61 分鐘	男	大二	1	跨學 科門 類
3	QY	2022/3/2	電話	67 分鐘	女	大二	1	跨學 科門 類
4	XJ	2022/3/3	宿舍	43 分鐘	女	大二	1	跨學 科門 類
5	MC	2022/3/3	宿舍	42 分鐘	女	大二	1	跨學 科門 類
6	ZL	2022/4/2	辦公室	45 分鐘	男	大二	1	同學 科門 類
7	XQ	2022/4/3	電話	55 分鐘	男	大三 (降級)	1	同學 科門 類
8	LC	2022/4/5	宿舍	56 分鐘	女	大四	1	同學 科門 類
9	WQ	2022/4/6	電話	62 分鐘	女	大三 (降級)	2	同學 科門 類

二、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

Lieblich 等認為敘事研究指任何運用或者分析敘事資料的研究 (Lieblich, Tuval-Mashiach, Zilber 著、王紅豔譯, 2019: 2-3), 敘事研究可以獲得實驗、問卷或觀察無法獲取的豐富而獨一無二的資料 (Lieblich, Tuval-Mashiach, Zilber 著、王紅豔譯, 2019: 10-11)。本文運用敘事研究方法是因為敘事研究有助於搜集到被訪者的鮮活日常生活文本資料 (張希希, 2006) 和避免過多地用外在的框架有意無意地歪曲實事 (劉良華, 2007)。以往的研究比較注重從大學管理的視角 (鮑麗薇等, 2017; 馬莉萍、張心悅, 2021; 任麗清、劉劍虹, 2009)、專業選擇權利的規範性視角 (郭為祿, 2005; 袁媛, 2020)、轉專業大學生群體特征和狀況實證研究視角 (方蓬, 2014; 馮偉光等, 2013; 吉久陽、皋春, 2019; 蘇強等, 2016; 熊豔青等, 2019; 閔妍, 2013) 進行, 缺乏從大學生的個體微觀歷程視角進行研究。因此本文運用敘事研究關注大學生的微觀視角及其個體敘事, 試圖從大學教育的服務使用者視角理解轉專業歷程。

Lieblich 她們提出可以運用「人生階段概覽」和相關問題把受訪者引向對自身人生階段的敘述, 然後針對與研究最相關的主題提出問題 (Lieblich, Tuval-Mashiach, Zilber 著、王紅豔譯, 2019: 28-29)。參照 Lieblich 她們收集敘事資料的方法, 本文設計的訪談大綱如下: 請問你轉專業的原因; 從大一入學到現在可以劃分為哪些階段, 具體的時間點; 為什麼這樣劃分你的大學歷程; 請描述每個階段的經歷; 在這些階段你覺得有意義的經歷或一段記憶; 這些階段遇到的挑戰; 你是如何處理每個階段的挑戰的; 每個階段對你有重要影響的人是誰, 為什麼; 你對之後大學生活的期望; 請您給以後想轉專業的人一些建

議；如果可以，希望從學校獲得什麼幫助。訪談過程中注意對被訪者的敘述路線保持開放性和彈性，避免過於機械性和正式性，以便獲得真實的生活故事(Lieblich, Tuval-Mashiach, Zilber 著、王紅豔譯，2019：29)。

Lieblich 等指出敘事研究分析可分為整體與類別、內容與形式兩個維度，其中整體方法關注個人整體發展狀況，類別方法關注某個定義範疇的部分，形式方法關注故事形式特征，內容方法關注故事內容(Lieblich, Tuval-Mashiach, Zilber 著、王紅豔譯，2019：13-14)。本研究圍繞研究問題關注被訪者轉專業的歷程、挑戰、對策和社會支持，關注被訪者陳述的故事內容，因而採用類別——內容的分析方法。類別——內容分析法重點關注故事獨立部分呈現的內容而不考慮完整的故事情景(Lieblich, Tuval-Mashiach, Zilber 著、王紅豔譯，2019：18-19)。類別——內容分析的具體步驟是：根據研究問題選擇標記所有訪談資料的相關部分形成子文本；定義子文本的內容類別；把資料歸入各類別；描述每一個類別下的內容，可以用頻次計數和排序，也可以描述分析每一類別下的內容，得出結論(Lieblich, Tuval-Mashiach, Zilber 著、王紅豔譯，2019：131-133)。

三、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部分，在被訪者知情同意前提下進行錄音，然後把錄音逐字轉錄至 MAXQDA2020 之後分析資料。為保證錄音謄寫稿符合被訪者的意思，錄音文字稿給被訪者核對。為保護被訪者個人隱私，被訪者的姓名進行匿名化處理。被訪者口頭同意在匿名化前提下可以對

訪談資料用作學術研究和發表，但是被訪者並無意願簽署同意書。

叁、研究結果

以往的研究大多關注大學生轉專業的意向（蘇強等，2016；熊豔青等，2019）或轉專業之後的適應情況（方蓬，2014；馮偉光等，2013；吉久陽、皋春，2019；閔妍，2013），很少針對大學生轉專業經歷的全過程進行研究。欧堪兰等（2015）基于霍兰德人职匹配理论建構转专业辅导模型帮助来访学生进行自我探索和外部探索，從她們建構的模型看，轉專業历程包括猶豫轉專業——探索——決定轉專業——轉成或未轉成——學業規劃的過程，有的學生不經過猶豫和探索就決定轉專業，他們的轉專業歷程是決定轉專業——轉成或未轉成——學業規劃。本文訪談的對象都是成功轉專業的，不同之處是有的被訪者是一次性成功的，有的被訪者是經歷了兩次才成功。如下表所示，本文經過對每一個被訪者錄音謄錄資料的編碼分析發現，大學生轉專業歷程可以概括為：探索期——準備及嘗試期——（失敗及再次嘗試期）——成功及適應期。其中「失敗及再次嘗試期」是第一次轉專業失敗後少數堅定要轉專業的大學生（WX 和 WQ）才會進入的階段。大部分被訪者都是大一下学期申请转专业并一次性成功的，有的被訪者（XQ）是经过较充分的自我探索之后决定在大二下学期申請轉專業并一次性成功的。

表 3 訪談對象轉專業歷程

歷程	代稱
探索期、準備及嘗試期、成功及適應期	HJ, QY, XJ, MC, ZL, LC 大一下學期申請轉專業成功; XQ 大二下學期申請轉專業成功
探索期、準備及嘗試期、失敗及再次嘗試期、成功及適應期	WX, WQ 大一、大二下學期兩次申請轉專業後成功

下文結合大學生轉專業的歷程對大學生在轉專業不同階段面對的挑戰、運用的對策和得到的社會支持進行描述。

一、探索期的挑戰和社會支持

探索期指大學生判斷自己是否適合原專業以及判斷要轉入什麼專業的階段。前人研究表明學業挫折、就業前景和興趣愛好等是學生轉專業的主因（蘇強等，2016）。

（一）個人興趣和就業前景觸發轉專業意向

本研究發現在探索期，轉專業大學生因為個人興趣或就業前景產生了轉專業的想法，並且開始考慮自己應該轉入什麼專業。個人興趣是影響大學生轉專業的重要因素，興趣是學習的動力，當大學生對所學課程不感興趣時很難專心學習，學習效率和學習效果差（潘石仁等，2013），因此轉專業大學生希望學習自己感興趣的專業獲得努力學習的動力。

「當時我高考的第一志願就是金融類啊，當時高考時自己看了很多專業嘛，我覺得還是金融類專業比較適合自己。」（MC 訪談記錄，

第 13 段)

「因為我在高考之前我是特別想去當醫生或者是從事醫藥相關的工作嘛。」(WQ 訪談記錄, 第 3 段)

就業前景方面,大學生考慮就業問題,包括未來行業的薪酬福利、個人晉升機會、行業發展前景等,他們會結合自己的情況和未來就業規劃嘗試選擇能滿足自己以後就業需求的專業。

「人生規劃的問題吧,我高中的時候就很想要以後念法學專業然後從事相關的工作,這個行業對我來說吸引力很大。」(LC 訪談記錄, 第 2 段)

「擔心以後就業的工作環境不好,然後我的身體一直都不好。我家裡人也很擔心,就一直很不喜歡這個專業,然後就一直跟我說以後的那個工作環境不好。所以我就轉專業,相當於給自己換一個日後的工作環境。」(QY 訪談記錄, 第 8 段)

葛曉梅(2011)的研究指出女性不容易找到工作,大學生就業中存在嚴重性別歧視。有女性被訪者擔心原專業在未來就業時女性受到性別歧視問題而產生轉專業的動機,所以有的專業讓大學女生受到更加嚴重的性別歧視。

「因為應用化學它這個專業它本科學歷的話受到的那個性別,就是以後在找工作的時候感覺受到的性別歧視會很大。」(QY 訪談記錄, 第 8 段)

在探索期，轉專業大學生面臨高中生轉為大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環境改變、個人目標不清晰、無法接納原專業、缺乏學習動力和心理問題等挑戰。他們嘗試通過參加感興趣專業的學習、瞭解轉專業資訊、積累成績和參賽經驗等硬體條件、諮詢心理醫生等方法應對挑戰。他們得到較多工具性和表達性的非正式支持，得到較少工具性和表達性的正式支持。

（二）情景變動與不接納原專業的挑戰

外在環境方面，大學生需要面對從高中到大學的學習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大學老師不像高中老師一樣推動學生學習，大學比高中的學習難度有很大跨越，大學老師教學不像高中老師那麼細緻，學生需要具備自學能力。大學師生關係不如高中師生關係那麼緊密，師生互動減少。大學比高中有更多課餘時間，大學生自身需要做好課外時間規劃，但是缺乏指導不知道如何制定目標和如何努力，容易迷失自我，同時大學遇到的同學比高中更厲害，競爭更強。高中到大學的情境變動易引發學生學習的無意義感、無力感和人生的無方向感，並誘發本科生角色實踐偏差和消極應對行為（包志梅，2022）。

「對大學老師其實不是很熟悉，感覺高中老師跟大學老師不太相同。高中老師經常見到，給我感覺是既要上課也要關心我身心狀況或規劃之類的東西；大學老師經常找不到，給我感覺他們上完課就沒有什麼關聯的關係。」（WX 訪談記錄，第 16 段）

「我來自不算特別好的高中，我從高中全班前幾名掉到大學全班中後，我一下適應不了大學要特別努力才可以獲得一個好成績。」（WQ 訪談記錄，第 22 段）

個人認知方面，轉專業大學生面臨無法接納原專業、缺乏學習動力、個人目標不清晰、心理低落的挑戰。無法接納原專業的情況分為兩類，一類是被錄取到非心儀專業，他們在上大學前或者上大學後很難認可原專業。根據高考分數選擇不想要的專業會讓大學生過上沉悶枯燥的學校生活（Mun-mi & Young-shin, 2013）。

「自己也是想一直想讀工科專業，然後當時被調劑到法學類專業。讀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還是不太合適自己。」（HJ 訪談記錄，第 7 段）

另一類是被錄取到自己選的專業，但是上學後漸漸發現與自己的期待不一樣。

「我當初選化學只是簡單考慮自己興趣和自己擅長領域，可是當我真正去接觸專業的時候，我感覺身體真的承受不了工作環境。」（QY 訪談記錄，第 159 段）

缺乏學習動力指面對非心儀的專業科目，心情沮喪，在學習上得過且過，只要能夠不掛科就行的心態。

「因為是被調劑的，所以就不太願意去學吧，一開始會感覺這樣。」（HJ 訪談記錄，第 19 段）

「對我來說大一那個階段都不能叫學習，學習狀態非常差，我那個時候還在適應，還在找自己喜歡什麼的階段。」（WQ 訪談記錄，第 14 段）

個人目標不清晰指對大學學習、生活和未來的工作沒有目標，不知道為什麼學習，將來做什麼的困惑。

「好像都是除了社團就是和同學們一起吃喝玩樂之類的了，這麼說就好像大一真的是都在快樂中度過，都沒有什麼意義。」(QY 訪談記錄，第 58 段)

「之前的話就是不知道要幹什麼，就跟著學校的課程學，但是就也不知道幹什麼。」(ZL 訪談記錄，第 12 段)

心理低落指失落、遺憾、無奈、抑鬱、沮喪的狀態。這種狀態如果不能夠消除會影響大學生的心理健康。

「我大一時其實狀態蠻不好的，我大一時成績不好，整個人狀態很差甚至去看過心理醫生那種程度。」(WQ 訪談記錄，第 12 段)

「大一時的確說真的不愉快，畢竟最開始填志願時感覺最少能中一個吧，但最終卻發現一個都沒中，所以的確很失望、很遺憾的。」(WX 訪談記錄，第 2 段)

(三) 探索自我與積累硬件的對策

面對探索期的挑戰，轉專業大學生嘗試發揮自身的能動性尋求突破。他們的對策包括嘗試參加感興趣專業的學習、瞭解轉專業資訊、積累成績和競賽活動等硬體條件、諮詢心理醫生。

參加感興趣專業的學習指通過輔修、交換生等方式學習自己感興趣專業的課程內容，探索自己是否適合想要轉入的專業。

「大二時我看到有輔修電腦的機會，我就讀一讀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感興趣。學的時候就感覺電腦還挺有意思，學那個程式設計跟離散數學，轉專業要考這兩門，跟著輔修去學了很久。」(XQ 訪談記錄，第 10 段)

「大二上學期我去韓國學習製藥工程專業，然後回國之後又去參加了社會實踐，通過實踐探索自己真正適合或喜歡哪一個行業。」
(WQ 訪談記錄，第 14 段)

瞭解轉專業資訊指搜集自己想學的某個專業或者某個專業大類的資訊，管道包括貼吧、小紅書、知乎、微博等網路平臺以及身邊的師兄師姐、同學、家人。通過瞭解其他專業課程、就業前景和轉入該專業的成功率和要求，轉專業大學生結合自己的條件和能力決定轉入的專業。

「從親戚那裡瞭解騰訊、阿裡的工作經歷，然後通過我大四的哥哥認識的朋友瞭解機械類和自動化專業的資訊，然後就找高中同班同學瞭解讀電腦專業的情況，最後綜合對比決定要轉入電腦專業。」(HJ 訪談記錄，第 13 段)

「對我來說瞭解資訊的挑戰不大，因為用手機技術能力很強，肯定有各種地方挖掘資訊，時不時去貼吧或者是知乎這些地方看。」
(WX 訪談記錄，第 8 段)

積累成績是為了滿足轉入專業對成績的要求，參與競賽活動有時候也有利於轉入心儀專業。

「因為轉專業是有績點要求的，你第一學期績點要排在多少名以前。所以為了能夠轉專業，得把原專業課程學好。」(HJ 訪談記錄，第 21 段)

「大一下的時候主動聯繫老師參加競賽活動，老師對那種想努力的學生都會主動提供很多的幫助。」(XQ 訪談記錄，第 22 段)

在非常無助的情況下，有的轉專業大學生也會去諮詢心理醫生。他們可能去學校心理中心諮詢，也可能去校外醫院或心理諮詢公司諮詢。

「一開始去學校心理中心，然後老師當時就建議我去到外面醫療機構，後來他們又建議我去了心理治療機構。」（WQ 訪談記錄，第 18 段）

（四）提供信息和協助決策的工具性非正式支持

正式支持來源包括大學、專業老師、輔導員、心理諮詢老師、醫院醫生等；非正式支持包括家人、朋友、同學、同鄉會成員等個人社交網路互動者和百度、小紅書、知乎、微博、微信公眾號等互聯網平臺。從案例的編碼情況看，4 人提及正式支持的編碼內容，8 人提及非正式支持的編碼內容，非正式支持比正式支持出現得更多。在探索期，轉專業大學生得到的工具性正式支持方面，大學提供的輔修和交換生機會、大學老師對於課外競賽的指導、一些同門類專業有相通基礎課等有助於大學生探索對其他專業的興趣以及積累轉專業的條件。

「因為電子商務它大一下學期安排 Java 程式設計課程，這個和我感興趣的其他專業聯繫緊密，我就考慮要不要轉專業，所以就去嘗試轉專業。」（ZL 訪談記錄，第 6 段）

但是學校除了在官網上通知轉專業的時間安排和其他規定與要求之外，並沒有系統性地為轉專業學生提供輔導與諮詢，需要大學生自行主動通過輔修課、選修課、交換生等機會自行整合有關諮詢判斷自己適合什麼專業、是否要轉專業、要轉去什麼專業。

工具性非正式支持方面，轉專業大學生從本專業學長學姐、同鄉會學長學姐、同學、朋友、家人、網路平臺（知乎、小紅書、百度貼吧、微信公眾號）等方面獲取自己原專業和可能轉入專業的資訊，判斷自己是否適合原專業以及轉入什麼專業。

「學校的話就是一些專業簡介，但是看不出什麼很具體有實質性的內容。我當時還是從身邊親戚朋友處瞭解到電腦專業前景還是比較不錯的，所以最後就選了電腦專業。感覺他們比較真實有幫助一些。」
(HJ 訪談記錄，第 29 段)

表達性正式支持方面，探索期的轉專業大學生在十分困惑的時候可能會去找學校的心理諮詢老師尋求幫助，他們從專業老師和輔導員那裡得到的表達性正式支持比較少，甚至還有不好的感覺。

「輔導員跟我聊天時讓我感覺是一個施壓的過程，然後答應我不告訴家長了，轉頭去告訴我家長，這件事情就會讓我覺得我被他背叛。」
(WQ 訪談記錄，第 37 段)

表達性非正式支持是轉專業大學生在探索期主要的情感支持來源，他們從家人、朋友、學長學姐那裡得到鼓勵和支持。參加轉入專業相關的社團有助於大學生通過社團經驗獲得幸福感和對轉入專業的渴望感 (Mun-mi & Young-shin, 2013)。

「支持的話同鄉會的一些師兄師姐也算，因為那個時候也有問了他們建議，他們給我一些有用的建議，然後也鼓勵我，堅定自己信念然後去做選擇。父母對我的態度就是只要我開心就好，也不做過多要求。然後高中的朋友他們比較瞭解我性格，也支持我。」(WX 訪談

記錄，第 12 段)

「父母就覺得如果說真的熱愛原專業沒有關係，但是不喜歡就算了，他們尊重我意願。」(MC 訪談記錄，第 56 段)

從案例的編碼數據看，工具性非正式支持被 8 個被訪者提及，其中提供信息（有關專業和就業的信息）被 7 人提及，協助做轉專業的決策被 4 人提及，有形的支持被 1 人提及。工具性正式支持被 4 個被訪者提及，其中提供獲得轉入專業相關的學習機會（輔修、交換生和轉入專業的專業基礎課）被 3 人提及，提供政策信息和提供指導各有 1 人提及。表達性非正式支持被 4 個被訪者提及，其中鼓勵（朋友、同學、同鄉會學長學姐鼓勵努力學習和轉專業）被 3 人提及，包容被 2 人提及，分享感受、陪伴、理解各被 1 人提及。表達性正式支持被 1 個被訪者提及，包括關心和心理諮詢。大一時出現明顯心理問題的 WQ 得到輔導員的關注以及得到大學心理諮詢中心、校外醫院心理醫生、校外心理諮詢機構的心理諮詢服務。綜上所述，工具性非正式支持出現最多，表達性正式支持出現最少，而且提供信息和協助決策的工具性非正式支持出現最多。從文獻看，一些學生不瞭解想要轉入的專業情況和畢業去向，他們想轉專業存在一定盲目性（閔妍，2013），大學應該針對此進行轉專業指導（唐紅妹，2009）。但是大學更關注現有的人力資源和硬體設施確定學校可以承受的轉專業人數（劉濤、蔣謙，2012），很少能做到清華大學那樣通過學業輔導部門開展轉專業諮詢輔導工作（歐堪蘭等，2015），在探索期可以避免學生選擇轉專業的盲目性（鮑麗薇等，2017）。本研究發現被訪者在試探期缺乏系統化工具性正式支持和表達性正式支持，主要通過工具性非正式支

持收集資訊、判斷自己是否需要轉專業和轉入什麼專業，通过表达性非正式支持坚定转专业的意向。

二、準備及嘗試期的挑戰和社會支持

一旦轉專業大學生經歷了探索期之後，確定了自己想要轉入的專業，就進入準備及嘗試期，他們需要瞭解學校轉專業的政策和相關通知，並根據學校、轉出學院和轉入學院的要求準備學習成績等資料和轉入專業的筆試與面試。

(一)「軟」「硬」限制和自身認知的挑戰

在這個時期，轉專業大學生面對環境的挑戰和個人認知的挑戰。學校的限制因素構成環境方面的挑戰。學校的限制主要包括轉出的限制和轉入的限制。轉出方面的限制是「軟」限制。即轉出學生的輔導員和專業教師並不十分支持本院系學生申請轉專業，雖然不會明確制止，但是在態度上不聞不問或勸退轉專業行為。而且輔導員、專業教師缺乏必要的心理學和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和技巧，所以在與轉專業學生溝通時難免引起學生不愉快。

「老師知道我要轉專業，什麼都沒跟我說。」(MC 訪談記錄，第 65 段)

「輔導員太離譜了，他說我原來學院是本校最差學院，原專業又是學院裡較差的，就算績點第一轉過去別人也不認可我，我真的很無語。很多老師都是這樣子叫你不要再轉了，包括系主任，太離譜了。」

(XJ 訪談記錄，第 64 段)

此外，有的大學生想要轉入的專業在其他校區，輔修或者旁聽的時間成本大，而且在疫情時期是不可以跨校區流動的。

「主要靠自學，因為當時大一是在 LD 校區讀的，然後電腦學院又是在 DX 校區，所以找不到管道旁聽，只能自學。」(HJ 訪談記錄，第 43 段)

而且旁聽的資訊需要轉專業學生自己收集，有的學生不瞭解相關資訊就會錯失在本校區去旁聽轉入專業課程的機會。

「其實我之前真的是失算了呀，有那種輔修的，週末會開課也可以去聽。就比如電腦的課在我們校區有開輔修，週末就可以去聽，但之前不知道，現在才知道。」(XJ 訪談記錄，第 93 段)

轉入的限制是「硬」限制。有的轉入專業會限制學生原來所學專業的門類或者高考時的科目，更常見是限制轉入前學習成績和轉入人數，而且不同學院每年的轉入方案具有不確定性，不同學院不同專業的轉入難度也是不同的。馬莉萍和張心悅（2021）的研究也指出政策僅取消了轉出要求而未取消院系的轉入要求，「對專業沒有興趣且能取得優異成績的學生才更有機會轉專業」的悖論依然存在。

「當時比較心儀的志願是物院的專業，但是我覺得我的績點不高轉物院很難，而且轉專業的機會很寶貴不想豪賭就選了一個比較保守的會計專業。」(QY 訪談記錄，第 23 段)

「感覺電腦專業是我們學校競爭轉專業最難的，全校只有 20 個名額，每年都有兩三百人參加競爭。」(XQ 訪談記錄，第 35 段)

「同一個學期你只能選一個學院一個專業轉，這是場賭博，如果

你要考電腦，你就相當於賭了一個機會了。」(ZL 訪談記錄，第 163 段)

「印象深刻的就是轉專業方案每年都會有變動，然後它又是考試前半個月才發佈。突然發現要考離散數學，我還沒學過，買書回來大概七八天把整本書學完去考試。」(HJ 訪談記錄，第 37 段)

除了環境方面挑戰，轉專業大學生還要面對個人方面挑戰，主要包括轉專業之後可能要降年級和個人猶豫不決。有的轉專業大學生是在大二下學期申請轉專業，他們可能是在第一次轉專業失敗後第二次申請，也可能是大二才確定自己想要轉入的專業。這些大二下學期申請轉專業的大學生還要面臨降級從轉入專業大二讀起的挑戰，而且對於女生來說年齡方面的焦慮比較明顯（例如 WQ）。同樣降級讀新專業的男生 WX 和 XQ 都沒對多讀一年書產生年齡方面的焦慮。

「後來是給我帶來了比較嚴重的一個年齡焦慮的。」(WQ 訪談記錄，第 10 段)

「不是誰都有勇氣降級的，本來和你一起上學的同学別人都畢業，你自己還在學校裡面。」(ZL 訪談記錄，第 129 段)

「大二的時候我就想著降一級的話其實也沒什麼所謂，……感覺就多讀一年的話，其實感覺問題也不是很大，我年紀也算比較小，然後也不是非常在意，……感覺就也不是非常的介意」(XQ，第 12 段)

在轉專業的準備過程中，有時候轉專業大學生也會產生動搖，即便經過了探索期，明確了自己要換專業，仍猶豫通過轉專業還是考研換專業。

「在成功轉專業之前比較困惑要不要轉專業？還是畢業時再考電腦研究生？最後想著還是努力試試，準備挺辛苦的。」(XQ 訪談記錄，第 35 段)

(二) 取得原專業較好成績和學習轉入專業內容的對策

這個時期轉專業大學生的主要對策是投入比較長的時間準備、學習轉入專業相關學科內容、自我寬慰等。面對環境限制，大學生需要在「競爭性」轉專業中獲勝才能進入心儀專業或「逃離」原專業。主要對策是努力學習獲得原專業較好成績和準備好轉入專業筆試和面試以及尋求幫助。

「轉專業面試考官是四個男老師，我頓感緊張，但當時大一也準備挺久的 PPT 等資料終於過關了。」(MC 訪談記錄，第 73 段)

「我很多不會的就去找輔修認識的同學問，然後他也很耐心的教我。不會的東西肯定要去問別人，主動尋求別人幫助挺重要的。」(XQ 訪談記錄，第 39 段)

(三) 工具性正式和非正式支持並重

工具性正式支持方面，這一時期轉專業大學生可以從學校官方網站得到有關轉專業政策資訊，可以通過公選課、輔修課等途徑學習轉入專業的課程，轉專業只要求上學期成績、課外競賽獎項不是必要條件、有的轉入專業只要求面試等可以減少轉專業的障礙性，有的輔導員為轉專業大學生提供必要的建議。

「當時轉專業整個流程，包括裡面要注意一些什麼事項，我當時都有向 J 老師瞭解過，他會給我建議和往年那些轉專業方案之類資

訊。」(HJ 訪談記錄, 第 53 段)

「其实压力还好,只是说会担心,但是我也很认真去准备,因为我只有面试,我觉得准备好面试也没那么难。」(LC, 第 23 段)

工具性非正式支持方面,轉專業大學生通過朋友、師兄師姐、社團、微信公眾號、網路課程等方式瞭解轉入專業的難度、課程內容,增加了準備的針對性和知識基礎。

「我經常會問本校讀電腦專業的同學,遇到不會的我會問他們,也會找他們要一些他們老師給的練習題,然後自己練習。」(HJ 訪談記錄, 第 63 段)

「準備轉專業面試時有很多好朋友還有師兄姐一起幫我準備,深夜幫我模擬面試還有改我的自我介紹,告訴我法學專業老師的學術偏好。」(LC 訪談記錄, 第 23 段)

對於降級的轉專業學生,他們畢業起碼延後一年,他們需要家人的支持,也需要家庭具備一定的經濟基礎。

「有考慮降級的影響啊。但是我個人覺得最主要看家庭的支持度和家庭情況,降級一年你工作延後一年,可能家裡負擔會更大一些。但對我來說這方面的顧慮可能稍微相對來說會小一些,所以就覺得沒有太大的關係。我當時就覺得家庭也沒有那麼大的負擔,就可以隨便試一下。」(WQ, 第 10 段)

在工具性非正式支持中,社團特別是同鄉會可以增加大學生接觸其他專業學生和了解轉入專業信息的機會,作用不容小覷。對於轉專

業大學生來說，當正式支持不足的時候，來自潮汕、客家地區等講究同鄉文化地區的人可以依賴同鄉會的非正式支持。Mun-mi & Youngshin (2013) 的研究發現參加轉入專業相關的社團的經歷可以激勵韓國藝體大學生轉入相關專業，強調了社團提供轉入專業體驗的機會，而本文發現有的社團可以提供轉入專業體驗的機會，不過更多的社團提供的是認識其他專業的同學從而獲取轉入專業相關信息的機會。

「還有一些不知道是經貿的還是管院的社團他有開 Python 的程式設計的課。那個活動我也去聽了。」(XJ 訪談記錄，第 91 段)

「同鄉會是好東西。其實那個指點我的師兄就是同鄉會的嘛，同鄉會裡的人會給你說很多的東西。但是像我一些室友他們就沒有這種東西，他們都不好意思找人聊天。那些師兄師姐就會跟你說一些情況，還有介紹已經在信管專業的師兄給我，他跟我說那邊專業要怎麼怎麼樣。」(XJ 訪談記錄，第 96 段)

面對轉專業的學生，大學的學生工作應該本著平等尊重的態度因勢利導和循循善誘(張俊娥等，2004)。表達性正式支持方面，轉專業大學生得到老師的互動與交心是很少的。對於專業課老師和輔導員來說，他們的立場讓他們很難去支持學生轉出本專業，因為這會影響學院某個專業轉出率和存續，只有個別老師或輔導員對轉專業的學生會有口頭上的關心、認可和鼓勵。個別輔導員還有對學生平時學習和生活的陪伴。

「就是有一個 X 老師我就賊喜歡她，因為當時我想轉專業，其他知道的專業老師都是勸我不要轉，但是 X 老師她就說我可以去試一下，不要管別人怎麼說。」(XJ 訪談記錄，第 60 段)

「班主任可能知道我有轉專業意願，然後就叫我加油。」(XQ 訪談記錄，第 54 段)

「J 老师我觉得他确实很好，就是在当时我在原學院那边一年时间学习生活包括平时的一些活动，他都很乐于跟我们一起参与进来，帮助我们。」(HJ，第 55 段)

表達性非正式支持方面，轉專業大學生從同學、師兄師姐、父母那裡得到精神上的包容、陪伴、鼓勵、認可和關心。

「原專業的同學他們都告訴我加油，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想轉，就會支持我，叫我加油。」(XJ 訪談記錄，第 130 段)

「大部分人都是大一時轉專業，大二轉的話就會面臨降級，當時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但是我家庭對我有足夠的支持度。」(WQ 訪談記錄，第 10 段)

從案例的編碼數據看，準備及嘗試期被訪者提及獲得工具性正式支持的人數有 7 人，其中 5 人提及政策信息支持，4 人提及合理的轉入條件規定，3 人提及轉專業相關知識學習機會，2 人提及獲得轉專業流程和注意事項的指導。有 7 人提及工具性非正式支持，其中 6 人提及提供轉入專業相關信息，5 人提及有形的支持（例如家庭的物質支持、學長姐和朋友幫忙改陳述材料、陪同學習等），2 人提及學習轉專業相關知識的機會，2 人提及轉入專業學習相關問題的解決。5 人提及表達性正式支持，其中關心、認可、鼓勵各提及 2 次，陪伴提及 1 次。6 人提及表達性非正式支持，其中包容、陪伴各 2 次提及，鼓勵、認可、關心各 1 次提及。因此工具性支持特別是其子編碼相對

于表達性支持被更多被訪者提及，工具性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被提及的人數相近。

三、失敗及再次嘗試期的挑戰和社會支持

轉專業失敗的大學生很多，但失敗之後不放棄的不多。這類大學生面對與之前轉專業相同的環境限制，而且相比一次轉專業就成功的大學生來說會遇到更多心理上的挑戰。

（一）負面情緒和糾結的挑戰

再戰轉專業的大學生要面對與之前一樣的轉出限制和轉入限制，而且還要面對轉入後降級的問題。在這個階段再戰轉專業的大學生心理壓力非常大，在失敗後他們會對自己產生懷疑或否定，感到自己能力不足或運氣不佳所以不能轉入自己理想的專業。想到還要繼續學自己不喜歡的專業，他們內心非常失落和沮喪，同時糾結於是否要再嘗試一次轉專業。深思熟慮決定第二次轉專業後他們的壓力更大，因為害怕再一次失敗以及周圍人無形的壓力。

「轉專業要求成績在前 15%，有特長，高考符合調劑等，然後學校覺得我哪一種都不太符合。」（WQ 訪談記錄，第 101 段）

「當年它只錄取八個人，我就很遺憾的排到了第九位，所以就更加遺憾和失望。我畢竟大二了，老師說大二最好就別轉了，周圍朋友也不是很支持，所以這段時期是一個自我否定和肯定的過程，不斷問自己真的要繼續走下去嗎？」（WX 訪談記錄，第 2 段）

(二) 主動爭取和改善心態的對策

對於轉出和轉入的限制，主動爭取為自己贏得機會。

「大二下學期申請轉專業時學院不同意，我當時就找兩邊學院教務員和原來高分子系一些教授去爭取。」(WQ 訪談記錄，第 98 段)

面對更大的心理壓力，轉專業大學生採取改善心態的方式緩解壓力。

「大二上學期去韓國做交換生，換了一個環境之後感覺心情就變好了。」(WQ 訪談記錄，第 28 段)

「通過做心理諮詢、回家、跟朋友出去玩減壓。」(WX 訪談記錄，第 45 段)

同時還要繼續瞭解轉專業資訊，有機會則輔修或選修轉入專業內容，通過實踐探索自己興趣和肯定自己轉專業意願。

「我有修讀一些像醫學免疫學、生理學這樣一些相關專業內容，還有去信訪局實習發現文科專業就業不合適自己。」(WQ 訪談記錄，第 82 段)

(三) 增強復原力的社會支持

工具性正式支持方面，再戰轉專業的大學生可以通過交換生、選修和輔修學習轉入專業課程，通過學院官方網站去獲得轉專業筆試、面試等資訊。

「我做交換生時學了一些物理、化學還有我感興趣的醫學英語、醫學免疫學的內容。」(WQ 訪談記錄，第 68 段)

工具性非正式支持方面與探索期、準備及嘗試期一樣，通過知乎等網路平臺獲得有關轉入專業資訊，通過父母獲得必要物質支持。

「像出國交流雖說是公費交流，但畢竟出國要支付一筆費用，機票、簽證、住宿這些錢父母都有給我支持。」(WQ 訪談記錄，第 148 段)

表達性正式支持方面，再戰轉專業的大學生有時會抑鬱、自我否定，無法自我疏導時非常痛苦，他們可通過學校心理諮詢室尋求幫助。有些專業教師也會給他們一點心理上的支持。

「心理方面問題我會找心理諮詢老師，大二上學期有一段時期突然就不知道怎麼，就是很抑鬱，很累，很自我否定，我去找心理諮詢老師，他給我疏導情緒方法，幫我減低壓力。…班主任沒打擾我，最後時期間我看法，然後也說要堅定信念，走下去就可以了，我感覺有正向支持。」(WX 訪談記錄，第 20 段)

表達性非正式支持方面，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雖然他們對大學的事情可能不懂，但是遇到困難時只要回家得到父母和家人關心，就能較好恢復心情，減少壓抑或低落的情緒。家人的支持還表現為支持再戰轉專業的決定。

「父母其實蠻支持我所做出的決定，如果沒有他們支持，很多決定我做不出來。轉專業的話，學院肯定會問到你家人知不知道小孩要轉專業，然後你同不同意他轉專業這樣的問題。」(WQ 訪談記錄，第 148 段)

本次研究中只有 WX 和 WQ 是第一次轉專業失敗後仍然堅持第二次轉專業的。從案例的編碼數據看，失敗及再次嘗試期被訪者 WQ

提及獲得工具性正式支持，支持的內容包括提供政策信息、提供出國交換學習和選修課學習的機會。WQ 提及工具性非正式支持，包括父母補助其出國交換學習的有形支持、網絡提供轉專業相關信息。WX 提及情感性正式支持，包括班主任對他二戰轉專業的關心和鼓勵，學校心理諮詢室提供的心理諮詢服務。WQ 和 WX 都提及了情感性非正式支持，包括朋友的陪伴、家人化解自己情緒和家人的包容。WQ 和 WX 都經歷了大一下學期轉專業的失敗，前者主要通過工具性支持走出困境，後者通過情感性支持走出困境，社會支持對兩者起到了增強復原力的作用。

四、成功及適應期的挑戰和社會支持

不論是一次轉專業成功還是再戰轉專業成功的大學生，當他們通過了筆試和面試成功轉入新專業，他們就進入既有成功喜悅又面對新環境挑戰的時期。這個時期比較積極的狀態是獎勵自己的成功，重拾自信，對未來目標更清晰，有動力學習；一些成功轉專業大學生還留在原宿舍或換宿舍後有更好學習氛圍；他們有的感覺融入新班級不算困難。但是成功的喜悅之後，轉專業大學生還是要面對新的學習環境挑戰。跨門類轉專業大學生面臨更多挑戰，他們換了新的學院，有的還換了新的校區。

（一）適應學習和生活新環境的挑戰

轉專業大學生在成功轉專業之後就要面對新的學習環境，跨門類轉專業大學生還要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大學生成功轉專業之後需要在

大學畢業前補修轉入專業大一時期沒學過的課程，因此比其他同學學習任務更重。相對來說，同學院轉專業大學生補修科目較少。

「因為我是在本學院轉專業，所以要補的課不是太多，就高數兩個學期、會計學、財務管理四門課，所以我壓力比較小。如果是其他學院轉入補修壓力更大。」(ZL 訪談記錄，第 51 段)

不過總的來說，轉專業大學生缺乏轉入專業大一學年知識基礎，與轉入專業原來學生的學習積累有差距，學起來更吃力。

「因為我沒有大一學年的法學基礎打底，所以其實我的法學思維跟同學差了很多，他們一下子就能想出來的東西，我反應不出來，跟起來很吃力。」(LC 訪談記錄，第 41 段)

他們需要很多時間去學習和複習，有時補修大一課程的時間和正常大二課程的時間還會衝突。

「這學期生活無比複雜，因為課實在是太多了。你想星期一是 1 至 12 節課都滿了，而且 8、9 節還有兩個課時間相同。我只好穿插著上，比較混亂。」(MC 訪談記錄，第 7 段)

跨門類轉專業大學生還面臨學習模式很大轉變，因為學科門類差異導致記憶、語言、邏輯、數學、操作等方面要求不同。

「以前我們學理科肯定是要知道原理然後推導出現在要學的東西之後還要應用它。我現在學會計學就是坐在那裡，老師說什麼是重點就畫一下，老師說要抄什麼我就抄什麼，比較偏重記憶。」(QY 訪談記錄，第 153 段)

面對上述情況，轉專業大學生缺乏學業輔導和諮詢教師機會。

「學習上的問題我很少會去問老師的，因為我轉入的專業是大班教學，像概率那些是四個班大課，你不可能跟老師有充分互動。」(MC 訪談記錄，第 44 段)

「那些老師也沒辦法幫你學習，不可能單獨為你一個人改變進度，只能靠自己。」(WX 訪談記錄，第 106 段)

因為轉入前的成績計算不明確以及轉入專業的競爭激烈，他們獲得獎學金難度加大。

「績點演算法挺亂的，有些課程它的內容沒辦法算，績點可能不是很高。」(WX 訪談記錄，第 92 段)

「我覺得轉入專業非常內卷，獎學金沒什麼希望。」(XQ 訪談記錄，第 69 段)

保送研究生很看重績點，學校政策沒有明確規定轉專業學生保送時的成績如何核算，轉專業大學生不知道自己能夠為保送做怎樣的努力。

「我覺得現在比較困擾的就是績點計算，我不清楚轉出專業的課會不會算在成績裡面，教務處老師也不清楚。」(XQ 訪談記錄，第 86 段)

「保送研究生對於轉專業的人來說還蠻難的，因為不知道要看哪個績點。」(QY 訪談記錄，233 段)

適應新的生活環境方面，有些跨門類轉專業大學生要適應新校區

硬體條件。

「這個校區大很多，宿舍和教學樓離得遠，走路要二十分鐘，需要一個適應過程。」(HJ 訪談記錄，第 71 段)

來到新學院之後，他們得到輔導員和老師的支持變少，在新環境不熟悉師兄師姐，人際關係和資訊都減少。

「轉入專業的輔導員管的人數多，經常沒法回復消息，感覺更多靠自己吧。」(HJ 訪談記錄，第 67 段)

「其他同學要獲取一些資源的話可以跟直系師兄師姐瞭解，但是我沒有。」(XJ 訪談記錄，第 103 段)

作為「插班生」比較難深度融入新班級，因為原有班級已經形成比較穩定人際關係。

「大二娛樂或團建都很少，而且集體基本定型了，加入這個集體可能會受到排斥。」(WX 訪談記錄，第 128 段)

有的轉專業大學生來到新宿舍後發現舍友間聯繫相對不緊密。

「我舍友有人是專業分流的，我們四個人是不同班的，平時聯繫沒那麼緊密。」(HJ 訪談記錄，第 134 段)

(二) 調動內在動力和能力的對策

內在方面，轉專業大學生通過調動內生動力、自我舒緩壓力、發揮自身學習能力和充分利用時間應對環境挑戰。雖然遇到新的學習和

生活環境挑戰，但是比起之前學習和生活更加有動力。

「靠我自己那種自覺性去學的。」（QY 訪談記錄，第 163 段）

他們通過聽音樂和休息等方式調節自己的壓力狀態。

「天天課這麼多，自己聽聽音樂，看看視頻，刷刷微博放鬆。」

（MC 訪談記錄，第 38 段）

學習的挑戰尤其需要調動自身的學習能力，特別是跨門類轉專業的大學生。

「其實最關鍵就是學習能力，特別是跨學科更要你有自學能力。」

（HJ 訪談記錄，第 153 段）

面對比別人更多的修課任務，轉專業大學生要兼顧學習和其他事情時間安排。

「我兼職時間是下午 4 點至 9 點，那其餘時間就用來看書，不論在地鐵上還是在教室裡面，有空時都在看書或背單詞，一切可用時間都要用上。」（QY 訪談記錄，第 169 段）

外在方面，通過主動收集資訊、發揮自身交際能力和積極擔任班幹部角色等方式應對挑戰。到了新的環境，有關的資訊或人際資源減少，這個時候轉專業大學生需要主動收集資訊。

「競賽的帶隊或者比賽時間點或需要注意的方面我主要靠自己
去學校的官網看，或是同鄉會師兄師姐經驗傳授。」（WX 訪談記錄，
第 120 段）

進入新的班級需要融入，轉專業大學生需要發揮自身交際能力認識同班同學。

「我交際能力還可以，日常我都能跟全班打招呼，平時小組集體作業我不擔心被落下。」(QY 訪談記錄，第 177 段)

面對更多學習任務和更困難獎學金獲取機會，轉專業大學生也會通過競選班幹部來增加自己的加分項。

「補修那麼多門課我還是競選學委，因為綜合測評可以加分。」(ZL 訪談記錄，第 264 段)

(三) 缺乏表達性正式支持

工具性正式支持主要體現為：授課教師理解轉專業學生要補課所以有些課程會衝突，適當在考勤方面有所放寬，避免學生左右為難；有的學院有平臺課，大一時本院學生都要學一些共同課程，同學院轉專業需補修的大一課程較少所以壓力減少。

「老師對我們轉專業學生比較寬容，在考勤還有平時作業給一些比較寬容的處理吧。」(HJ 訪談記錄，第 97 段)

「有那種學院平臺課嘛，管理學、經濟法、經濟學等課我們管院大一時都要學。沒學過的同學轉專業之後他就要補很多課。」(ZL 訪談記錄，第 53 段)

工具性非正式支持方面，轉專業大學生通過家人、同鄉會、師兄

師姐、同學、朋友、室友、互聯網和社會等管道獲得資訊與任務性支持。

「瞭解到同學是在工作室，可以跟他們組隊參加比賽。」(HJ 訪談記錄，第 114 段)

「覺得學起來難的時候我有去問過很多師兄姐的意見，包括家裡長輩的，多聽別人的想法總結別人的經驗再看看自己的特點，慢慢去摸索看誰的經驗會更適合自己。」(LC 訪談記錄，第 29 段)

表達性正式支持方面，輔導員通過讓大學生自己選宿舍間接給予轉專業大學生表達性支持。

「新的輔導員他給了我兩三個選擇吧，然後我最終選了有認識的朋友的宿舍，所以宿舍這方面適應沒有問題。」(WX 訪談記錄，第 98 段)

表達性非正式支持方面，轉專業大學生通過新同學和新朋友、已有的朋友、原宿舍的同學等獲得情感方面的支持。

「我今天考補修大一的課，我的班長對我說加油。」(XJ 訪談記錄，第 56 段)

「有同伴在一起備考其實就不會特別難熬，有時會和朋友在圖書館天臺那裡看風景，有朋友一起跟你準備一個很重要的考試互相陪伴支持對方的經歷對我來說還是很有意義的。」(LC 訪談記錄，第 45 段)

從案例的編碼數據看，成功及適應期被訪者提及獲得工具性正式支援的人數有 7 人，其中問題解決、提供學習機會、提供資訊各有 3

人提及，提供指導有 2 人提及。提及工具性非正式支援的人數有 7 人，其中提供資訊有 7 人提及，提供指導有 4 人提及，有形的支援有 3 人提及，學習的機會、提供協助、問題解決各有 2 人提及。情感性正式支持沒有人提及。情感性非正式支援有 7 人提及，其中 4 人提及陪伴，2 人提及分享感受，1 人提及鼓勵。方樂等（2007）研究表明轉專業大學生產生抑鬱的重要原因是生活事件以及孤獨感，轉專業學生學習壓力高於未轉專業者；方蓬（2014）的研究發現轉專業大學生學習效果欠佳，人際交往中轉專業小集體凸顯，參與課外活動減少，能力發展平臺在一定程度上受限等特點，指出大學的輔導員、授課老師等學生工作者應該以轉專業大學生的心理和行為良性引導為核心目的開展師生交流。本研究也發現轉專業學生在成功和適應期需要補課，學習的課程多而且課程的時間有衝突、學習壓力大，同時進入新的專業班級需要建立新的人際關係，而他們可能會和其他轉專業學生形成小團體（例如 MC、ZL），或者和自己本來就認識的朋友形成小團體（例如 QY、WX）。因此需要大學的學生工作者主動介入，促進轉專業大學生積極融入新的班集體，但是從研究結果看，表達性正式支持卻是無人感受到的。

肆、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聚焦大學生轉專業歷程及其中的挑戰、自我對策和社會支持，運用敘事方式收集資料，運用類別——內容視角分析資料，發現轉專業大學生分為一次性轉專業成功和二次轉專業成功兩類，前者經

歷的歷程是探索期——準備及嘗試期——成功及適應期，後者經歷的歷程是探索期——準備及嘗試期——失敗及再次嘗試期——成功及適應期。其中失敗及再次嘗試期是一些堅定的轉專業大學生在第一次失敗後仍然嘗試第二次轉專業才會經歷。在探索期，轉專業大學生面臨的挑戰主要是從高中進入大學的情景變動和內心不接納原專業的挑戰。在準備及嘗試期，轉專業大學生面臨的挑戰主要是轉出學院的「軟」性限制，表現為輔導員、專業教師的不支持的態度和勸說不要轉專業的言行；「硬」性限制是轉入學院提供的名額是有限的，需要在轉出的專業獲得必要的績點的要求以及在轉入學院參加筆試、面試之後經過淘汰才可以進入新專業；此外還有自身認知的挑戰，即是否通過考研究生來轉換專業以及女生對於降級轉專業延遲畢業的年齡焦慮。失敗及再次嘗試期是兩次轉專業才成功的大學生會經歷的階段，挑戰主要是第一次轉專業失敗後的負面情緒以及是否還要轉專業、轉什麼專業的糾結，第二次轉專業的壓力比第一次更大。成功及適應期的挑戰主要是適應新專業的學習壓力和新建人際關係，轉專業大學生要補修課程所以比起非轉專業的同班同學學習壓力要大，而且進入新的班級，有的甚至進入新的校區或新的宿舍，需要努力適應生活環境和新建人際關係。

面對不同時期的挑戰，轉專業大學生採取的對策和得到的社會支持有所差異。探索期轉專業大學生主要採取探索自我適合什麼專業、積累成績和參賽經驗的對策，得到的支持主要是工具性非正式支持，特別是轉入專業的學習和就業情況的信息和協助決定轉入什麼專業的決策的工具性支持。準備及嘗試期轉專業大學生主要採取爭取轉出專業大一上學期或大二上學期有好的成績、努力學習轉入專業內容應

對轉入專業筆試和面試的對策，得到的支援主要是工具性正式和非正式支持，特別是轉專業政策資訊和有關轉入專業的資訊、轉入規定合理、家人朋友學長學姐的有形支持等工具性支持。失敗及再次嘗試期轉專業大學生主要採取主動爭取轉專業機會和改善心態積極進取的對策，其中 WQ 得到的是工具性正式和非正式支持，WX 得到的是表達性正式和非正式支持，這些支持都有助於他們兩個增強復原力從而克服挑戰。成功及適應期轉專業大學生主要採取調動自身動力和學習能力、時間管理能力的對策，得到的支持主要是工具性正式和非正式支持、表達性非正式支持，研究發現他們缺乏表達性正式支持。

轉專業大學生能夠經歷探索期到成功及適應期的全過程，成為轉專業競爭中的「勝利者」，他們自身的轉專業意向和能力是很重要的，同時他們也需要得到社會支持。本研究發現大學在大學生轉專業過程中提供的工具性、表達性正式支持是相對匱乏、碎片化、隨機化的。因此，不同於前人認為專業選擇權是大學生的學習權利，大學生在轉專業過程中實質獲得的是個體化競賽權利。在轉專業過程中，學校扮演公平競爭環境提供者和裁判員角色，通過轉出和轉入的「軟」、「硬」限制性條件以及碎片化的工具性和表達性正式支持既增加了轉專業的個體化競爭激烈性，又增加了自身保障大學生專業選擇權的形式正當性。通過讓少數「勝利」的申請者成功轉專業，讓多數「失敗」的申請者繼續留在原專業保證了組織的秩序性和個體的有限流動性。轉專業大學生則是個體化參賽運動員，為了個人專業選擇權與其他申請轉專業的大學生進行競爭，他們要依靠個體自身主觀能動性應對探索、準備及嘗試、失敗及再次嘗試、成功及適應的過程，通過收集與整合碎片化的工具性、表達性正式和非正式支持增強自身的勝算。然而大

學生轉專業歷程有濃厚的個體化競賽性質，這對於渴望獲得專業選擇權的大學生來說增加了自身的身心壓力，甚至可能導致他們學業困難和喪失學習動力。值得注意的是，轉專業過程不僅是大學生個體的較量，也是他們背後的地緣文化條件（例如 WX 和 XJ 從「同鄉會」得到支持）、家庭背景（例如 LC 和 MC 的家長和親戚可以指導她們進行專業的選擇和學業與職業的規劃，WQ 並不擔心家庭經濟負擔）和社會性別條件（例如 WQ 降級轉專業為自己年齡焦慮，而 WX 和 XQ 無此擔憂）的較量。因此大學不宜只是扮演公平競爭環境塑造者和裁判員角色把轉專業過程變得過度個體競爭化，而應該從大學生的專業選擇權、大學生的成長以及社會公平的角度增強正式支持，減少個體性別、家庭背景、地緣文化條件等因素的影響。

本研究的結果啟發社會工作教育應當培養學生的學習權利意識、批判意識和賦權意識，增強社會工作專業學生倡導能力和社會行動能力的教育和訓練，培養未來的學校社會工作者從大學生個體成長的角度出發，爭取推動大學規範化和體系化工具性和表達性正式支持。社會工作教育也應培養學生對於轉專業大學生需求的敏感性和服務策劃以及執行能力，使學校社會工作者有能力開發針對性的社會功能預防、恢復、發展的正式服務，協調正式和非正式的資源，營造有助於轉專業大學生釐清職業生涯發展、個人學業發展和獲得必要支持的友善校園環境。此外，社會工作專業教育還應當培養學生的社會性別意識和社會公平意識，對於女性、社會弱勢家庭子女有特別的關注和給予他們必要的賦能，幫助他們在轉專業的個體化競賽之中獲得更公平的機會。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訪談對象選自一所非 985、211、「雙一流」

的普通大學，單選一所大學作為研究範疇雖然有助於理解在同一個組織背景中轉專業大學生的歷程及相應的挑戰、對策和社會支持情況，但是不能推論到其他普通大學或者 985、211、雙一流重點大學。為了更全面地了解轉專業大學生歷程的挑戰、對策和社會支持情況，還需要隨機抽樣重點大學和普通大學進行大樣本定量研究。本研究只是運用質性研究方法從社會支持的理論視角呈現了大學生轉專業歷程的社會支持變化，為後續相關研究提供一些參考。

參考書目

- Bäulke, L., Grunsel, C., & Dresel, M. (2021). Student dropout at university: a phase-orientated view on quitting studies and changing major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24.
- Lieblich, Tuval-Mashiach, Zilber 著、王紅豔譯 (2019)。《敘事研究：閱讀、分析和詮釋》。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2005)。〈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0503/t20050325_81846.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2017)。〈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702/t20170216_296385.html。
- 方樂等 (2007)。〈某高校轉專業學生孤獨感與抑鬱狀況的配對研究〉。
《中國心理衛生雜誌》，11，751。
- 方蓬 (2014)。〈轉專業大學生適應性調查分析—以安慶師範學院為例〉。
《高校輔導員學刊》，6(6)，69-72。
- 王峰、李欣玥 (2021)。〈不少「准新生」寧願留級也要轉專業〉。
《21世紀經濟報導》，7月2日，版6。
- 包志梅 (2022)。〈我國高水準大學學困生的形成過程與邊緣化軌跡研究〉。
《中國青年研究》，4，112-119。
- 任麗清、劉劍虹 (2009)。〈論大學生專業選擇權〉。
《教育發展研究》，17，29-32。
- 吉久陽、皋春 (2019)。〈高校本科生轉專業問題與對策研究〉。
《教育教學論壇》，33，9-11。

- 江彬(2015)。〈學分制背景下大學生教育選擇權的保障研究—基於歐、美、日的經驗〉。《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5，90-95。
- 別敦榮(2004)。〈我國現代大學制度探析〉。《江蘇高教》，3，1-3。
- 宋偉濤(2014)。〈大學轉專業「無間道」〉。《中國教育報》，10月28日，版5。
- 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2012)。《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臺北市：洪葉文化。
- 金勁彪、韓瑋(2016)。〈完善新建本科高校學生專業選擇權的幾點思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103-106。
- 唐紅妹(2009)。〈試論大學生轉專業的教學管理〉。《山西財經大學學報》，S1，264-266。
- 袁媛(2020)。〈大學生專業選擇權的屬性與實現機制研究〉。《江蘇高教》，9，67-72。
- 馬廷奇、鐘穎(2017)。〈英國大學本科生專業選擇與轉換模式探究〉。《現代教育管理》，8，119-123。
- 馬莉萍、張心悅(2021)。〈自由轉專業政策如何影響學生的轉專業行為—基於院系間學生流動的視角〉。《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4)，93-103。
- 高昌明(2015)。〈地方高校大學生專業選擇的現狀分析與對策〉。《教育與職業》，8，106-108。
- 國家教育委員會(1990)。〈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511/t20151119_220038.html。

- 張希希 (2006)。〈教育敘事研究是什麼〉。《教育研究》，2，54-59。
- 張俊娥等(2004)。〈轉專業政策對護理本科新生的影響及相應的對策〉，《中華護理雜誌》，9，52-53。
- 郭為祿 (2005)。〈試論高等教育契約關係與教育消費選擇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8-42。
- 閔妍(2013)。〈關於高校本科生轉專業問題的思考—以中央民族大學為例〉。《民族教育研究》，24(4)，54-57。
- 陳肇男、林惠玲 (2015)。《家庭、社會支持與老人心理福祉：二十世紀末的臺灣經驗》。臺北市：聯經。
- 渠敬東 (2006)。《現代社會中的人性及教育：以塗爾幹社會理論為視角》。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馮偉光、籍穎、朱偉 (2013)。〈大學生轉專業動機及適應性分析〉。《高校輔導員》，2，63-66。
- 葛曉梅 (2011)。〈基於離散選擇模型的大學生就業歧視影響因素研究〉。《統計與決策》，15，103-105。
- 熊豔青、徐丹、劉聲濤 (2019)。〈研究型大學轉專業意向學生學習經歷的實證研究〉。《當代教育論壇》，1，48-57。
- 劉良華 (2007)。〈教育敘事研究：是什麼與怎麼做〉。《教育研究》，7，84-88。
- 劉濤、蔣謙 (2012)。〈試論農林高校轉專業的供需對接〉。《黑龍江高教研究》，30(8)，68-70。
- 樊華強 (2012)。〈論大學生的學習自由權及其限制〉。《黑龍江高教研究》，30(6)，16-19。
- 歐堪蘭、顧佩、沈若萌 (2015)。〈學業輔導在轉專業輔導中的運用與

- 實踐——以清華大學為例〉。《教育探索》，11，71-75。
- 潘石仁、王帥、衛彥君、張會梅（2013）。〈高校轉專業制度探討——基於學生「混學分」現象的分析〉。《教育探索》，4，63-66。
- 鮑麗薇、馬昱春、李向榮（2017）。〈轉專業大學生的志趣培養和品質保障〉。《大學教育》，2，127-130。
- 韓曉玲、邵振綱、劉中興（2006）。〈華中師大 147 名本科生轉專業〉。《湖北日報》，2 月 19 日，版 4。
- 韓雙森、謝靜（2021）。〈「雙一流」大學創新人才培養戰略研究——基於 C9 高校建設方案的文本分析〉。《現代教育管理》，5，30-37。
- 蘇強、張東、周健民、林征（2016）。〈本科生轉專業問題的調查分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7-102。
- Mun-mi, J., & Young-shin, W. (2013). 대학 동아리 경험자의 전공전환에 대한 현상학적 연구. *Dance Research Journal of Korea*, 71(1), 93-110.
- Whitehead 著、刘玥译（2019）。《教育的本质》。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